独龙民族“拔节抽叶”的寓言

——读马瑞翎长篇小说《独龙江上的小学》

石彦伟

如何文学化地书写独龙族?在遇到马瑞翎的《独龙江上的小学》之前,这是个颇具难度的提问。这个生活在独龙江流域人口不足一万的边地民族,长期陌生于公众视界,无论本民族自我表述还是他者言说,都显得极为稀缺。哪怕仅仅基于这一个原因,这部小说的书写已经与生俱来地携带着令人敬重的气场。然而让我更为惊讶的是,马瑞翎几乎根除了一个文明外部世界的“代言者”所惯见的局蹐,举凡带有风俗猎奇式的描写都被她决绝抛弃,好像这是她与独龙江人民的一个契约:若书写你们,我就一定要用你们的方式,和你们在一起。

如此简单的一句要求,殊不知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“他者”。局外者眼中新奇有趣的部分,于本民族人民而言很可能司空见惯,甚至不屑、不喜、不愿表达。作者对这种分寸与界限的在意,是显明的。比如对于大众而言,提起独龙族来,文面女可谓是最具神秘色彩的热度元素,但在本书中,相关描述仅有一句,便节制地不再打开。我相信,在怒江谷地有着长期田野经验的马瑞翎不是不知写什么、怎么写会更抢眼,但她骨子里的立场,使她的书写对象本能地集中在了更为“普通”、更为下沉、由此也更为艰巨的“日常”世界,将对土地民众的敬意持续到了最后一行。读此书,就像是跟随作者走进独龙江峡谷的山寨,和小主人公阿鼎一家人一道,过起了最慢的日子,沉实,安详而自洽。

与戏剧冲突的叙事技巧相比,让那些散落在生活细部的碎片重现光泽,无疑更能考验作家的真诚质地。理发师用松明在人脑袋上点火;爬树前先在脚上涂树脂;在麻绳上打结做账本;给生病的牛灌酒治疗;把老柚木溜梆找出来,给滑轮上油;“过溜索”的驴子吓出了尿,而羊“顶多只是咩咩叫”“人变成了一只鸟”……看似不动声色的一笔笔,实则都是不可复制的在场经验的萃取,确证着作者身为都市女性知识分子的民众底色。不说别的,仅言“妈妈扒拉着柴,用竹钳把几个芋头从火塘里夹出来”这最简易的一句,如若不是与山寨民众长期融为一体,是否会把钳子精准地形容为“竹钳”,而非木钳、铁钳?有写作实践的读者尽可感知,要写准一个词汇,不知要付出几多观察与知识储备。恰恰是这些密布于文本、不大那么惹眼的民生细节,使独龙族人民的真实生态得以纪实化地存证,挽留下一个民族在时代变迁前夕的表情与温度。

这部小说的妙趣不在张扬,却体贴在情味深处。耐人品咂的一个细节是,两个外地人站在溜索前为孩子拍照,他们看到孩子穿得单薄,基于好心,摇首发出“真可怜”的喟叹。但其实,当地民众并未觉得如此,“我们的麻布大短裤和褂子,还有夹趾拖鞋,穿起来可方便、可凉快了!”这就是来自文明外部与内部的差异。作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在地体验,站在离民众和生活最近的距离,回应了我开篇提出的诘问。

但意义才刚展开。与日常生活、民俗图景相比,马瑞翎显然更着力探寻的是独龙人与众不同的生命意识:他们如何看待神鬼、自然、生与死,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,如何看待自我与社群。这是本书超越了那些止步于叙事本身的普通儿童题材,而具备了民族志价值的不赏之功。“树是神仙的头发”“谁都不可以随便动神仙的毛发”,即便仅是烧掉一些干草枯枝,阿鼎父亲也要在岩石上供奉两个荞面饼子,恭恭敬敬地祈祷,于是有了书中那段声动梁尘的“生命宣言”:“请所有的蚂蚁、蚱蜢,/所有的小虫虫们,会飞的请飞走,/会跳的请跳开,/会爬的请爬走,/我要放火烧地了,/我不得不烧……”正是由于独龙等少数民族“万物有灵”天人观念的浸润,他们看待山川草木心存敬畏,多了几分柔软与悲悯。他们认为人的生存与进化,绝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,因此在他们眼中,学校里开着小白花的操场就是桌子,担当力卡山就是围墙,这是“世界上最大、最美的餐厅”;老师用独龙语宣布的“校规”,不是什么“不许迟到”,而是“不准爬树”“不准捅马蜂窝”“不许捡人家树上掉下来的核桃”……这残留着原始气息的规约,尽管在今天看来显得迟滞而陌生,但它们确实曾经真实地存在于独龙江畔,曾经留下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存的影像定格。

未必硬要扣在什么“自然主义”的概念上,但我留意到,但凡写到自然,马瑞翎真的就和她笔下的阿鼎一样,飞身上了溜索,一切都变得恣意洒脱,毫无阻遏。她流连于常人忽略的风景,一眼就可以洞穿动植物的奥秘:写树木把树冠搭在一块儿,“就像好朋友互相搭着肩膀那样”;“藿麻草的叶子像是用绿纸剪出来的小心脏”;阿鼎认识几千种叶子,“就连叶子落在地上快要变成肥料的时候”也认得出;写上学时间,并非以日期为界,而是说“玉米棒子黄了的时候”;写雪地上动物的脚印,“就像写在白纸上的字一样”,那是“动物写给人的信”;破坏庄稼的山鼠、獾、野猪,“只会认为自己是来做客的”。再比如,当阿鼎为没能得到玩具小马而哭闹时,他的父亲会说:“可是你有一整座山的东西”。或许可以断定,马瑞翎的叙事抱负,远不止于儿童上学这一表面线索,而是伸向了天地万类的生存伦理,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解共融。她赋予造化以尊严,写出了山民孩童独一无二的富有感。

我还注意到一个情节,是说阿鼎问起三个哥哥去了哪里时,父亲回答说:“他们到祖先那里去了”。不消说,这与独龙族认为人和动物有两个灵魂:“卜拉”(生魂)和“阿细”(亡魂)的生死观念有关。他们以“彼岸世界”看待生命的终极价值,因此父亲认为,死去的三个儿子“日子好过得让人不知道太阳落山了”,并且轻描淡写地谈论死亡,坦言“我们迟早也要到那儿去的”。独特的生命意识是少数民族文化中普遍集藏的养分,也是区别于主流价值的文化多样性之体现。阿鼎与父亲不经意的一问一答间,实则隐现着多元文化观的神韵一笔。

阿鼎短短一学期的上学记,看似闲淡不惊,其实浓缩着“山乡巨变”的时代节奏,显示了一个民族文化复兴、“拔节抽叶”的梦想与决心。从故事一开篇“骨科医生”意象的出现,就埋下一个隐喻,像是民族骨骼中的传统机能重新被激活前的踌躇与准备,那把在孩子头上“噌噌”刮过的镰刀,终有一天会变成老师手中的推子。一如从未溜过索的阿鼎,很快就可以独自飞跃天堑;从未讲过汉话的孩子们,艰难地喊出第一声“到”。那个恐惧坐车、总把祖先带在嘴边、喜欢用老手艺自制竹木家具的父亲,还有害怕上医院因而痛失孩子的母亲,也终有一天不必再溜索,而是走上新修的江桥。马瑞翎替一个古老民族写下了一个现代性的寓言,在新与旧迎头相碰的路口,思索冲突与和解的永恒命题。与我们一样,作者当然在为阿鼎们永远不必再溜索上学而宽慰不已,但更为可贵的是,那些急遽消逝的乡愁记忆,同样也没有被随手丢进历史的尘埃,而是像那根溜索拆掉以后再无用武之地的老溜梆一样,被阿鼎父亲珍惜地“挂在墙上”。或许走桥去上学的阿鼎们长大后,有一位也成为了作家,他会重新取下这根老溜梆,重述这段往者不可追的童年风景。而那可能是比本书出版更让马瑞翎宽慰的一刻。

哀悼恩师方克立先生

谢青松

“方先生走了!”昨晚10点22分,这条仅仅五个字的信息,是我几天以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到的最终结果。尽管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,但真正得知恩师离世的那一刻,还是如同五雷轰顶,让我的情绪彻底失控,在书房里失声恸哭!

在人生当中,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之前,往往会有某种极为精微的预感。4月11日晚,我梦见去北京找方克立先生,但是只见到了师母黄老师,而未能见到方先生。醒来之后,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。次日早上跟赵娟说起这个奇怪的梦,她说,你是想念方老师了!于是我当天给方老师写了邮件,信中感慨道:“这么多年来,在学术圈中讨生活,汲汲于名利,如今回想起来,其实,师生之间的缘分和情义,比学术上所有的‘成功’更加宝贵、更有意义!”4月13日,收到方老师的回信:“2013年你来社科院做‘西部之光’访问学者,真是一种缘分。你做的题目是《群书治要》,但敏锐地意识到‘马魂中体西用’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,指出它开创了学术研究新范式,有力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。一年内你写了六篇文章,两本论集的编辑出版更是对扩大此论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。我在《马魂中体西用: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》‘序’中,以及《五四百年的思想史意义》中,都专门提到了你对‘马魂中体西用’论的贡献。就此而言,我是非常感谢你的。”信末还特意叮嘱,为了在学术上“发挥更大作用”,希望我还是“去北京工作”。方老师的回信似乎并无异样,这也让我一颗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。然而,20号上午11点,突然接到杜运辉的信息:“方老师在望京医院,这次是心脏堵塞。今天下午做动脉造影,可能同时做心脏支架。”这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不祥之感。方老师晚年健康欠佳,求医问药成为常态,但能否经受得住一场手术的折腾,这是我最为担心的。事实上,正是由于术后的不良反应,方老师最终没有逃过这次庚子年之劫。

与方老师的缘分,要追溯到2007年春天。那一年,我报考了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,导师就是方克立先生。考完试之后,从天津转车到北京,生平第一次与方老师见面。或许是性格相近,再加上老乡情谊,我们聊得非常投缘。后来的面试环节非常顺利,最终被南开大学录取了。但那一年,我同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,几经周折,竟然也被录取了。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,我经历了内心的百般纠结,最后放弃了南开,到了人大读博。记得当时方老师还鼓励我:“夏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,你跟着他好好学习。何况,在北京,我们见面也更方便。”在北京读书那三年,每学期都去拜访方老师,海阔天空地聊天,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博士毕业之后,我回到了云南工作。2013年,单位选派我为中组部“西部之光”访问学者,我毫不犹豫地在表格上填上了唯一的志愿“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中国哲学专业”。当时的想法很单纯,就是弥补当年的遗憾。或许,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缘分,早已是命中注定,该发生的,必定会发生,只是或早或晚罢了。但是,命运给了我们一种“选择”的假相。我常常在想,与方先生的缘分,估计就是如此。

到了北京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方老师。由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两个校区,老校区在望京,新校区在良乡。记得当时膝关节受伤尚未痊愈,我一瘸一拐地爬到方老师在四楼的办公室,方老师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打趣我:“人胖了!腿瘸了!”他拿出一把钥匙,告诉我,帮我在望京校区也安排了一间宿舍。平时住在良乡校区,周末来望京校区,便于交流。同时还拿出一张饭卡,告诉我:“这是老校区食堂的饭卡,上周就办好了,里面存了两百块钱,你来望京这边住,方便去食堂吃饭。”拿到饭卡那一刻,我鼻子一酸,眼泪都出来了。傍晚,方老师和师母请我在楼下的饭店吃饭。我坚持要买单,方老师坚决不同意,黄老师告诉我,入学之后,请学生吃饭,这是方老师的惯例,你不要破坏了。饭后,我去找一个博士期间的室友,方老师生怕我找不到公交车站,坚持送我上公交车,看着老人家蹒跚离开的背景,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。先生慈父一般的关怀,成为我求学生涯中难以忘怀的记忆!

那一年,我平时住在良乡校区,周末去望京找方老师。记得有好几次晚上,老人家跑到宿舍,颤巍巍地来敲门,他说,散步路过这里,顺便跟你坐一坐。我们或聊学术问题,或者只是拉拉家常,到了10点左右,就送老人家下楼,看着他走进家属楼。有一次周末去找方老师,得知他因此推掉了当天在北大的学术会议,我告诉他,其实我们可以再约时间的,他回答:“跟学生见面比参加学术会议重要”。2013年末,寒假将至,我和同学杨绍军准备返昆,临走之前又去了望京。从良乡到望京的校车,通常6点多就到了,但那天是周五下午,气温骤然下降,堵车特别厉害,我给方老师电话,让他不必等我们,早点回家休息,方老师口头答应了。晚上9点40分,我们终于到达望京校区,发现老先生一直都在办公室等着我们。他说:“不见到你们,我不放心。”行文至此,泪水又模糊了双眼。访学结束那天,我和杨绍军在校园里感慨说,能不能申请延期,我们想继续待在北京学习,我们舍不得离开方先生,那是我们当时真实的感受。

访学期间,我的研究方向是《群书治要》研究。由于跟方老师交流特别充分,对他的思想动态也非常了解。于是,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提出的“马魂中体西用”论。访学期间写的每一篇文章,方老师都亲自修改,印象最深的一次是,《马魂中体西用与当代中国学术范式之建立》一文,方老师不仅仔细修改了文字上的错误,甚至直接添加了不少论述。后来,这篇文章发在《马克思主义研究》。由于各种因缘,访学结束之后,我将“马魂中体西用”论的相关文章结集,陆续在人民出版社推出。文集虽然是我编的,但实际上,方老师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,其中有一本书,方老师校对出了一百多处错别字和引文疏误,令我十分羞愧。

2019年11月2日-4日,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“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论争与‘马魂中体西用’综合创新文化观学术研讨会”,与方老师再次相聚。11月3日上午,方老师做了主题为“五四运动的思想史意义”的演讲。这是我在离开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,再次聆听恩师的讲座,也是最后一次!讲座那天,方老师精神状态较好,连续讲了两个半小时。会后我还跟杜运辉开玩笑,我们得好好养生,争取到了80多岁还能讲两个半小时。4号上午,送方老师上车时,我还特意跟他说“您多多保重,下次我再去北京看您。”没想到,这一别,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永别!

记得3月16日晚上,方老师打来电话,说“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,想跟你聊聊天”。在电话中,方老师认为我在学术上应当“有更大的成就”,鼓励我“去北京发展”。这是老先生的一贯主张,并且做了许多实际上的努力。可是我并不“领情”,告诉老人家,我就喜欢昆明的生活,甘于“平庸”的人生。不曾料想,这就是我和方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。今早打开电脑,看到这些年跟方老师的邮件往来,谈学论道,嘘寒问暖,居然有301封。我截图发给杨绍军,说“从今天起,再也收不到方老师的邮件了”,泪水再一次喷涌而出!

昨晚,我发信息给一位朋友,告诉他“方老师走了”。朋友反问:“他去哪里了?”我知道,他是在启发我,要去探寻生死的真相,在最终意义上,既没有出生,也没有死亡,死亡只是一种幻象。他告诉我,“死亡是最大的谎言。无论如何,你必须发现这个——亲自发现它。当别人说死亡是存在的,或者死亡不存在,那都没有用。只有你亲自发现的,才能够让你超越生死的幻象。”可是,面对恩师的离去,我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眼中的泪水。我多么希望,恩师的离开,也“只是一种幻象”!我常常想,师生之间,必定有着某种甚深的缘分,尤其是与方先生之间亦师亦父般的情义和心灵相契,在这个人情寡淡、重名重利的所谓学术圈中,更是稀有难得。虽然我深知,言语难以表达心声,然而,还是用这些凌乱的文字记下了与方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,以及自己内心无比的悲痛!

沉痛哀悼恩师方克立先生!先生一路走好!

第十二届

云南日报|文学奖
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

云南日报文化生活部
主办

云南省文联
云南省作协
云南北辰高级中学
协办

“与新中国同行”文学征文获奖名单

由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云南省文联、省作协、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联合推出的“与新中国同行”文学征文,自去年4月中旬启动以来,在云南日报文化副刊“花潮”版上共发表了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体裁的文学作品共近60篇(首)。这些热情讴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,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,抒发各族人民的家国情怀,以文学的形式反映70年来云南的历史性变化和巨大成就的文学作品,绝大多数来自全省各地作者的踊跃投稿,从征文启事发出之后,自然来稿占了绝大多数,来稿量上千。

除了从大量的自然来稿中选择具有真实性和鲜活细节的作品之外,“花潮”版还着意约请一些名家和专业作家写稿,以更深入和全面的视角描绘70年的“云南记忆”。因此,这一次征文不仅着重于个人、家庭、家族70年,个人史中折射出的关于物质、精神生活的变化,也是民族史、家国情怀、历史记忆的最真实和最具体的体现。同时,也兼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发展的一些重大事件。

征文结束后,我们约请了省内知名作家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对所有刊发在“花潮”上的征文作品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评奖。现将评出的奖项及获奖名单公布如下,获奖证书及奖金将随后寄达。

编者按

特别荣誉奖	《这样改变了命运》	丹　增
	《仰望东大门》	黄　尧
一等奖	《曲靖交通的奇观》	张庆国
	《我爷爷的回忆录》	卢　静
二等奖	《有一种记忆叫“远方”》	李俊玲
	《长水起航的记忆》	倪嘉云
	《天生之桥》	李朝德
	《滚滚石磨》	批　娘
	《电视机变迁记》	胡正刚
三等奖	《路,走对了》	魏天慈(口述)魏向阳(整理)
	《回村访人》	赵鸿翔
	《爸爸的缝纫机》	崔婧雯
	《开在舌苔上的野花》	李光彪
	《我为祖国寻宝藏》	倪守昌
	《我的怒江,我的祖国》	和四水
	《在路上》	叶多多
	《竹子上的尊严》	叶浅韵